



王胜军

著

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本书力图在往哲先贤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取长补短，在儒学两重性的特殊角度下，进一步以更翔实的资料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作整体而深入的梳理，希望对清初庙堂理学的内涵、外延做出较明确的界定，对其组成部分道统、治统、学统进行界定说明，并对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整体中的作用进行论证说明，同时考量作为参照系的民间学术与其之间的互动，以清初这个特殊时代为背景和依托，建立起一种学界认同的新儒学形态以及考察传统儒学的新观念、新范式。

岳麓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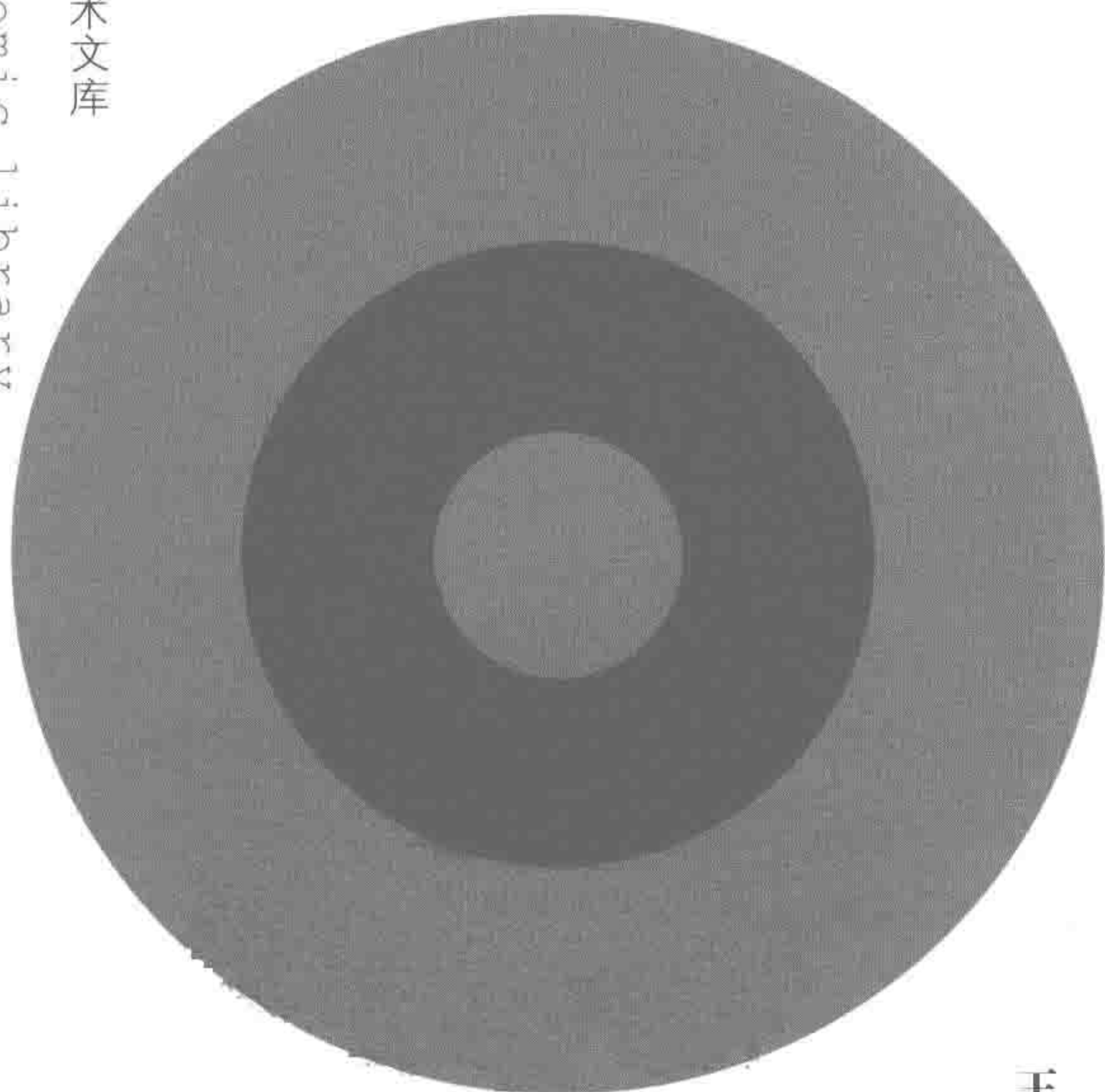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王胜军 著

岳麓书社·长沙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庙堂理学研究/王胜军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5.9

ISBN 978-7-5538-0338-8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清前期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8029 号

QINGCHU MIAOTANG LIXUE YANJIU

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作 者:王胜军

责任编辑:刘 文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萧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tmall.com>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3.25

字数:356 千字

ISBN 978-7-5538-0338-8/B · 152

定价:32.00 元

承印: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前言

对于本书的议题，我常怀有自信，又颇存有疑惧。自信的是，儒家精神是如此不可磨灭，在清初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山河破碎、社稷倾覆的时代，一个社会失序、人心失范的时代，一个民族隔阂与仇恨加剧冲突的时代，儒学的光芒，不仅暗地里慰藉着那些志行高洁的隐逸之士，还攀登到政治的高峰向王权发出了告诫并挥手指引。这使我深信，儒学揭示的是宇宙的本源，是人世的法则，是心灵的律令。它是实学，是科学，不是玄说，不是臆断。因此，每当人类历史出现了最复杂、最危急的问题，儒学就能大放其异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覆——对于每个人的心灵也是如此。

我又有深深的疑惧，就是儒学在不断蜕变，儒家精神在不断向现实妥协。任何学说都不可能仅停留于言说，正如儒学，一旦当它走向现实，是否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价值，却不能不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儒学究竟如现代学者所谓的在历史上是思想的主流？还是如朱子认为的“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考诸清初的那段历史，只能说儒家的理想国还远远没有建立。可畏的是对它的曲解，可畏的是枉尺直寻，这种可畏不仅存在于儒学与王权之间，也存在于儒学与士大夫以及社会诸阶层之间。所以，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何以正名？孔子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而反己以求为难。

我之有深深的自信与深深的疑惧，还因为本书的议题与当今的时

代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不是吗？这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为什么儒学又要复兴？因为中西文化在冲突，因为物质文明的泛滥正在使人类心灵枯竭，因为功利主义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形成巨大隐患……新文化运动以来，斯文一脉几坠万劫不复之深渊，而有识之士，奋臂一呼，则影从云集，遂大灿其光，这是何等的伟力！我深信这必是基于天理的伟力！

然而，我又怀疑惧。疑惧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紫之夺朱，长久以来，儒学不断被有意或无意地修饰、曲解、利用，儒学的真精神究竟何在？儒学的真精神与其在历史中的具体形态之间关系又如何？或者是计其成败，不求其是非，大讲“中庸”之道；或者是手持意识形态思维的利剑，身披儒学“正统”的傲慢华袂，抛弃了格致诚正而大讲修齐治平；或以片段的知识代替格致诚正，盛气以求人者多，虚心反求诸己者少。至于利用儒学，遂其私欲，又等而下之了。所以，没有冷静的思考、缜密的分析、准确的判断，并付之笃行，那儒学又何以复兴其真精神呢？

对于本书的议题，我还有一种反求于己的信心与疑惧。我之有信心是认为这个议题极其重要，纵然有读者不会去认真翻阅，纵然在这个学术著作出版目不暇接的时代它终将被淹没，但是我的思考会伴随着我——本书将是我对儒学、对历史进行思考包括自我反思的一个里程碑。当然更多的是疑惧。惧是本人学术素养不足，所论断者尚多错漏；疑是对某些问题还缺乏更为清晰认识、还远未达到孔子所谓的“不惑”。因此，我更愿意将本书出版作为一种自我鞭策，更希望学界同仁能对本书大力鞭挞，以便使我在疑惧中不惮于前驱，去找到那对天理的终极的自信。

王胜军

乙未年夏于筑城照壁山

目录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意义	001
	第二节	儒学与国家意识形态	005
	第三节	清初庙堂理学界说	010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016
	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019
第 一 章	清初庙堂理学的确立 023		
	第一节	满族文明及其汉化	024
	第二节	康熙亲政前清帝国的情形	037
	第三节	康熙帝的理学思想	050
	第四节	康熙中后期的庙堂与理学	067
第 二 章	清初庙堂理学与道统 084		
	第一节	新王朝与儒家道统	085
	第二节	御纂经典中的道统精神	101
	第三节	庙堂诸子的道统意识	117
	第四节	道统向新朝、庙堂和皇帝的转移	137

第三章	清初庙堂理学与治统	155
	第一节 崇三代：王道理想的确立	156
	第二节 格君心：朝廷政治的变革	175
	第三节 举贤才：理学官僚的选用	189
	第四节 正风俗：社会教化的开展	203
	第五节 厚民生：经济秩序的恢复	222
	第六节 怀远人：边疆及域外关系的处理	234
第四章	清初庙堂理学与学统	249
	第一节 魏裔介：复程朱人性之善	250
	第二节 熊赐履：重建对天理的敬畏	263
	第三节 李光地：天人沟通的伦理化	273
	第四节 汤斌：道德本源的确立	285
	第五节 张伯行：实践理学的形成	294
第五章	庙堂理学与民间意识形态	304
	第一节 民间理学与庙堂理学	305
	第二节 庙堂理学与清代考据学	324
	第三节 庙堂理学与佛、道两教	339
第六章	清初庙堂理学的特点	356
	第一节 道统、治统合一前提下的强制性	357
	第二节 夷夏互进民族观基础上的开放性	362
	第三节 宗教色彩与游牧传统下的满族性	367
	第四节 以独尊与调和为标志的折中性	372
	余论	378
	附录 顺、康朝庙堂理学大事年表	385
	主要参考及引征文献	405
	后记	418

绪 论

开篇明义，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清初顺治、康熙朝（1644—1722）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以康熙帝、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人的理学思想以及朝廷编纂的诸种御纂儒家经典，比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及《日讲五经解义》等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概称之为“清初庙堂理学”。作为参与到清初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那一部分儒学，清初庙堂理学不仅反映与论证了当时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相当程度上对它反映和论证的对象产生了影响。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意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曾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像陈列品一样走进自己的博物馆。^①虽然从七十年代以来，列文森的这一论断便饱受批评、屡有争议，但是一种悲观的情绪仍然笼罩在现代儒学研究者的头顶。^②比

①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② 李景林：《儒学之“魂”的附“体”与新生》，《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如，有学者将现代儒学比喻为“游魂”，可能也只是怒其不争，严肃地抛出问题，并期待于现代儒学能够走出这种困境。这种心境，应该是许多儒学研究者共同拥有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儒学在外王走向上的屡屡受挫和难有振作。

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被冠以“专制护符”的恶名，于是在许多海外新儒家的研究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去儒学的政治化，力图将儒学限制在道德修养的“私领域”中，或者是发展出一套与西方哲学抗衡的“崭新而有说服力的道德推理”；然而，这“究竟还算不算儒学恐怕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儒学是内圣外王、体用不二之学，依其本义，它必然要从格致诚正走向修齐治平。近代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又引进“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以期打倒孔子这尊神圣偶像，但是，在大幅度引进西方制度及思想之后，造成的制度与制度背后精神脱节的问题、思想与传统之间的不融合问题都逐渐凸显。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民众的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精神追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历史惯性都与儒家对外王政治的追求和影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些年来，大陆出现了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由于生长在内地，与海外新儒家不同，大陆新儒家特别要求恢复儒家的政治功能，这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也是儒学本义中修齐治平的自我冲动。就此来看，从内圣外王或体用合一的角度去研究传统儒学势在必行，清初庙堂理学作为理学进入庙堂之后的产物，它既深刻地展现了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儒学学理层面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

对儒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影响到学术界对历史的考察，并进一步影响到现实学术及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判断。清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古代社会，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虽然这个末代王朝离开我们才一百多年，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对于清军入关及其所维持的近三百年之久的统治却已经是褒贬不一，甚至判若天渊。虽然，在这个

新王朝的统治下，中国现今的辽阔版图得到奠定，诸民族逐渐认同、中华民族的观念渐趋形成，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民安物阜之局——“康乾盛世”，中国文化也在考据学的繁荣中得到一次大总结。按道理说，它所取得的成就放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毫不逊色。然而，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以及它所面临的西方近代文明，都成为这代王朝的“致命伤”，这两者都与儒学有关。一是庙堂理学究竟对这个异族王朝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亦即清王朝是“满化”还是“汉化”的问题——曾为清史研究界所热议^①，其实它从清初士人对新朝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就已经展现出来；二是庙堂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近现代历史的影响，面对欧美文明的输入，究竟是促进的、还是阻碍的。前者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问题，而后者关乎传统文化复兴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庙堂理学不仅会为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一种独特的视野，或异于传统史学叙事或新清史的史学叙事，它还将提出一个国家或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即怎样才是开万世太平的世界。比如，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建立在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追逐的是物质文明；但是儒家却关心的是分配是否公正、社会是否和谐、生活是否安定，^②为此并不支持以功利为导向的工商资本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进化论的鼓动下，将两千余年来的中国看作一个长期停滞的历史，然而这却与儒家关心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认清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得失，以及对明末清初的历史剧变甚至整个清王朝作出客观评价，都有必要深入研究清初庙堂理学这一国家意识形态。

对清初庙堂理学进行研究，还可以使传统儒学在政治、民族、外

①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

② 参见《论语·季氏第十六篇》，当时鲁国权臣季氏将伐颛臾，孔子对冉有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些观念与儒家一向追求治平而非物质积累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

交等方面所蕴藏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得以“复活”，从而对我国现在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起到推动作用。软实力（soft power）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①传入我国之后成为政府部门和知识精英的热门话题，提法也逐渐转变为“文化软实力”。^②儒家文化具有文化软实力的特征，它体现为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政治，与霸道相对立，具体来讲，它主要包括以“仁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以“礼乐”为手段的制度体系，以“教化”为施展文化软实力的途径。^③因此作为儒学形态，庙堂理学具有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处于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地带。目前，中国正处在五千年巨变之际，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对西方亦步亦趋。相反，必须依托于自己的传统，即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西方对话。^④清初庙堂理学登上历史舞台，或深或浅地影响清代二百余年，无论得失，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历朝国家意识形态之集大成，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天政治、学术、道德、文化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形式，或多或少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传统中去，从考察传统、尤其是清初儒家文化如日中天之际时的传统，从中取精去粗、去伪存真，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清初庙堂理学，对于今天我们复兴民族文化、致力于国

① 参见《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对外政策》杂志中《软实力》（Soft Power）一文，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软实力、硬实力两种，认为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和动力，它能够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它涵盖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参见张国祚《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1期。

③ 朱汉民：《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④ 杜维明：《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对话西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2日。

家强盛，对于如何贯彻中央意志，如何廉洁官僚队伍，如何促进学术独立，如何淳良社会风俗，等等，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儒学与国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之初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其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阐释，但是争议非常大，以致被称为文科领域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① 本书之所以仍然要引入“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因为它最能体现儒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最适宜表述两者之间联系的性质和功能。当然，由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极端复杂和存在广泛争议，本书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界定。

在学术界的一般理解中，意识形态往往被缩小到政治领域中去，尤其是天然地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专属概念，其实不然。^② 实际上，意识形态是一套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生价值的观念，是人类精神与现实社会互动的产物。从广义来看，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个体、群体两个方面，本书的概念倾向于后者，指某个时代具体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一套观念，来源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过程，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特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并且这一反映具有阶层性、地域性、时段性。同时，意识形态也表现出人类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意愿，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前瞻

① 托拉西之外，前后对此问题进行关注的有培根、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曼海姆、霍克海默、阿尔都塞等著名学者，可参考伊林·费切尔为俞金吾《意识形态论》所作之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第二章第一节《意识形态的内涵》（齐鲁书社，2003年，第47—56页）对这一概念亦有详细梳理。

②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6页。

性，亦即并非机械地对社会存在进行反映；意识形态还具封闭性、排他性，它有强调自己内部认同的冲动。

从阶层性来看，国家意识形态是全社会诸意识形态金字塔中的最高一级，它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提供给社会成员的一套包括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多个维度的观念组合，这套观念组合自觉地、系统地、直接地反映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作为社会意识诸形态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它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综合反映。它凭借自身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从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引导民众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认同，并以自己的理念为民众描绘出未来的美好蓝图及其实现方式。长期以来，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理论依据；除此之外，儒学也会为其他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提供滋养，从而形成民间的儒学、士大夫的儒学。不过一个稳定的时代，国家意识形态是其他诸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处于最高一级。

儒学在历史上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儒学既有“独善其身”、“格致诚正”的内圣诉求，又有“微言大义”、“修齐治平”的外王冲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即儒学与统治秩序一体化，从理论依据上为现存制度辩护，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它又没有完全意识形态化，而是始终保持着学术性，并分化衍生出新的学术形态，拥有批判现实与批判自身的功能。学术与意识形态的最大不同在于：学术拥有理性反思的能力，而意识形态是既定观念；学术是某一时代精英思考的最高层次，而意识形态则是指导人行动的一般的、普遍的认识；学术能超越时代，它具有批判性；意识形态则只能局限于特定的时代，以灌输为特色。

从历史来看，作为学术主流的儒学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同一的，又是不同一的：东汉以前，今文经学立于学宫，是学术主流和意识形态，古文经学则流行于民间；东汉以后，古文经学渐成学术主流，至唐立于学宫；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宋代是学术主流，但至宋末也未完全成为独尊的官方学术；元、明、清三代皆立程朱理学为官学，而明

中叶以后阳明心学却发展为学术主流，乾嘉及晚清则又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交替成为学术主流。总而言之，儒学本身不断分化衍生，当一种儒学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之时，儒学基于其内在的学术冲动，又必然分化出新的与之对抗的学术形态。这说明，处在不断分化衍生中的传统儒学具有学术与政治、超越与现实的二重理性，是学术与政治、道统与治统、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确切地说，只有与王权结合的、上升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儒学，才能称为国家意识形态。

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依靠“道统”、“治统”、“学统”三者来完成的。这三个名词由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揭橥，传之久矣，近现代学者关于道统、治统、学统的划分、界定和命名与古人颇有差异，自己内部也不尽相同。^①因此也有必要对“道统”、“治统”、“学统”的内涵进行简要说明。“统”之意为“纪”、“绪”、“始”、“总系”，依笔者来看，它表现了某一意识形态在诸意识形态中的绝对地位和唯一合法，将诸社会意识形态构建为一个以它为起始、总纲、统率的儒学传承谱系。“道”、“治”、“学”与“统”的结合，实际上是儒学在这三个方面同社会进行互动的产物，因此道统、学统、治统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是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必由之路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道统意识在儒家由来已久，理学时代的道统发端于韩愈的《原道》一文，但是作为一个有哲学意义的名词被提出来则是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从外延上来看，理学家所提倡的“道统”仅仅只是一个按时间排列的人物序列，既不涉及制约现实的政治理论，也不涉及

① 相关学者对道统、治统、学统的理论阐释，可参考贺麟《学术与政治》、牟宗三《略论学统、道统、政统》、郑家栋《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蒋庆《儒家的生命之道与政教传统》、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王思睿《政统、道统与学统》等文章。

心、性、理、气等具体概念；但是就其内涵而言，道统将理学诸概念推向现实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理学在与现实政治博弈中的神圣性、合法性，是其实现外王理想的重要支柱和根本前提。具体来讲，理学道统担负着某种终极关怀的作用，是文化心理认同的基础，又表现为一定阶层或社会集团的“话语权”。正是因为有这三个方面的作用，道统不可避免地成为王权争取的对象，以便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寻找依据，从而促成民众对它的认同。

“治统”又称“政统”，指儒学视域中王朝传继的合法性以及这种合法性所依赖的儒学对王权影响而形成的政治传统。治统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道统，儒家认定某一政权是否符合为治统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精神，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地狭民寡的蜀国为正统，便展现了理学在衡量治统时使用的主要标准。治统在传统社会中由王权来代表，它本身对民众有权力意义的权威性、神圣性，是增进同一政权下民众向中央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一。治统中儒学成分是其合法性依据的主要来源，大如井田、封建、学校等制度，小如乡举里选、嫡长子继承制等成法……统治者可以因时、因地对它进行损益，但是其基本原则却要向儒家精神靠拢。当然，影响治统的绝非仅是儒家，佛家、道家、法家等各种思想都有可能为其提供合法理论依据，只要民众认同，这种合法性就会存在。历史上对治统影响最大的当属儒、法两家，概言之，儒家治统观可以称之为“王道”政治，与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霸道”政治相对。

“学统”含义亦多歧，古代在使用学统时多与道统相同，比如熊赐履《学统》，出于研究的必要，本书将之界定为基于概念的义理分析及章句训诂考释的儒家学术传统。儒学自形成以来，学术层面就极为重要，无论是儒家内部学派流衍，还是它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都会与儒学学术的变迁有关。宋明以来，儒学的学术化特征越来越突

出，到清代中期甚至出现了以学统代替道统的潮流。^① 理学在学统上的表现以义理分析为主要风格，濂、洛、关、闽、湖湘、浙东等众多儒学派别的理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心、性、理、气等概念而展开，但是这些概念的使用，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甚至不同情形之下，往往有它特定的含义，这也成为自赵宋以降诸理学学派彼此区别的学术基础。这种基于学术的传承形成的传统便可以名之为“学统”。

就道统、治统、学统三者关系而言，道统是儒学与王权结合的理论前提，治统是儒学影响王权的现实基础，学统是道统、治统的学理依据。相对于道统、治统，学统最接近于学术、最远离政治，突出地展现了儒家在学术层面的客观性、超越性、纯粹性。道统通过儒学人物的序列，将儒学学理与现实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是儒学在教化层面的具体展开，它以极具宗教色彩的信仰凝聚力、文化渗透力、话语号召力，将儒学推上作为评断现实政治“法官”的神圣宝座，是在传统社会维持自身独立品格和制约王权专制的重要武器。治统中儒学成分之多寡，是儒学能否纲纪朝廷、泽及生民的关键。宋明以来，理学家们的最终理想社会“三代之治”便是治统与道统合一，^② 亦即现实政治运作的彻底儒家化，而两者结合的前提，又在于学统的确立和显扬。可见，道统、治统、学统三者相辅相成，最终推动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影响着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一般理解中，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似乎具有天然独尊的特性，其实不然；秦王朝以法家思想罢封建、置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为后来两千余年来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形态确立了“纲领”，儒学虽然在历经焚书坑儒的浩劫后与法家作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几乎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但是却很少在现实中去突破法家提供的“纲

① 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2006年，第55—111页。

② 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6页。

领”，理学大师程颐、朱熹甚至将汉、唐时代的盛世伟业视作“以智力把持天下”的霸道政治。另外，佛、老之学自魏晋以来便对中国历史产生着广阔而深远的影响，很多时候对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影响往往超出儒学之上，放眼历史，信仰儒学的皇帝百不一见，追捧佛老者却比比皆是，韩愈谏唐宪宗迎佛骨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往往也大量夹杂着其理想精神的蜕变，也就是说，改变自身的某些理论和价值并试图以此枉尺直寻得君行道，汉朝的叔孙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为行道而媚主，鲁儒所不耻，却被司马迁称为“汉代儒宗”，其所传之儒学究竟丧失或保留了多少儒学精神呢？凡此种种都说明，各个时期儒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节 清初庙堂理学界说

儒学从本质上作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又不断分化传衍出新的形态，这是清初庙堂理学出现的根本原因。春秋之前，学在官府，是为“王官之学”；宗周既衰，私学兴起，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一时之间儒、墨、道、法、阴阳等百家诸子群星斗耀，班固《汉书·艺文志》最早对官方的庙堂之学下移为民间学术这一文化变迁做了概括总结。^①从此，中国的学术在文化领域中便形成了庙堂之学与民间之学的两大分野。清初也是一个学术大分化时期。儒学自南宋以来，“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②，王学兴起之后，更加专注于心性方面，整个明朝“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9—1745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页。